

Global Net-
全球



Work Economics
网 络

Global Net-

Work Economics

经 济

萧 琛 著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国防大学 2 065 795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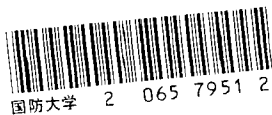
GlobalNet -
全球



Work Economics
网络
经济

GlobalNet - Work Economics

萧琛 著



国防大学 2 065 7951 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网络经济/萧琛著. - 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8. 9

ISBN 7-5080-1571-1

I. 全… II. 萧… III. 计算机网络-技术-影响-经济-
世界 IV. F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6423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开本 11.25 印张 267 千字 插页 2

1998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定价:25.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代序

从全球网络经济看东亚金融风暴

东亚金融风暴^①也许已尘埃落定,但关于这场新型危机的理论探讨却远未告一段落。本文拟从全球经济的角度提出关于“网络金融危机”的一管之见。其中一些见解得益于本书中一系列的考察和研究。特此权且为序。

^① 鉴于日元滑坡问题严重,似乎也可以谓之“第二波”。同墨西哥金融危机等类似,这一类金融风暴是一种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新型危机,我称之为“网络金融危机”。频繁和快捷是区别于传统经济危机的显著特点。



鉴于这场危机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国外有的学者甚至将它同1929年的大危机相提并论,认为它在“经济紧缩”、“货币贬值”和“贸易保护”三个方面与那场大危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国内也有学者认为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另一场“总危机”。

就这场危机的里程碑性质、部分表现形式和严重程度等而言,上述论断也许不无道理。但更值得关注的问题应是:随这场危机而来的肯定不再是一场绵延十年的令人谈虎色变的“大萧条”,而只是一场时间不会很长而且会比较平和的市场清理过程,虽然它难免会触发一些国家的政治和社会问题。

如果说30年代大危机开创了倚重自然资源和制造业的国民经济时代,那么,八七股灾、墨西哥金融危机、东亚金融风暴等则在开创倚重信息资源和金融服务业的全球网络经济时代。如果说过去的经济危机主要是国别的,那么现在则主要是国际的;如果说过去的经济危机主要是实际经济的,那么现在则主要是虚拟经济的。

传统经济危机理论主要是从(封闭的)国民经济出发的。遵循传统,理应将东亚各国的共同问题抽象成一种经济体,然后分析它的银行呆账、房地产泡沫、政府融资非效率、比较优势产品不当等因素,还有资本如何外逃,从而触发这场危机。否则,就只能是国别比较分析,结果也只能是形态各异的一群“新”危机。

应当指出这样抽象是很困难的。因为一些国家或地区的银行和政府效率原本并无(甚)问题,但它们的经济却惨遭厄运。例如,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等。相反还有一些国家或地区,如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潜在问题并不逊色,但却由于其它原因而岿然不动。可见,这些爆发危机的国家不仅是制度环境和经济成长阶段不同,而且爆发危机的条件也迥然不同。

上述抽象难以成立的另一理由是:按传统分析,这些国家的“东亚金融风暴”应该说是早已爆发且远未平息,而这显然与事实和普通的观念不合。传统危机因素在东亚国家可谓由来已久。日本自 90 年代初以来,经济走走停停,泡沫经济破灭,银行体系破产动荡,今年一季度又出现 23 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日元在 3 年中对美元居然贬值了 80% 还多,等等,早已是公开的现实。直到目前为止,经济还没有见到转机,日元更是一个世界性的“无底洞”。韩国、泰国也如此。韩国大企业集团的问题绝非到金融风暴爆发前夕才开始严重。可见,危机的“阵发性”必须得到解释。

二

东亚金融风暴既是在冷战结束、自由企业思想大传播、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信息网络(金融)覆盖全球、FDI(外国直接投资)和组合投资重点大转移、衍生资本广为流行、套利基金到处兴风作浪、全球金融险象环生的背景下爆发的,也是在东亚“奇迹”持续多年、“政府驱动型”新兴市场空前活跃、泡沫经济愈演愈烈、银行呆账积重难返、虚拟经济和实际经济过度脱节、区域联动机制青黄不接的条件下出现的。

显然这是世界经济史上一场前所未有的更为典型的新型危机。除了传统要素以外,“制度”和“信息”因素已经在发生重大作用。新危机是在“网上金融实体”同一系列新兴经济体(实质是非网络经济体)的冲突中间发生的。全球网络的“加速效应”,使得各国的“制度差”和“信息差”成了危机的必要条件。危机的冲击波来自网上“无国界经济实体”促成的“国际融资制度效率崩溃”,而不再(主要)是传统国民经济的“资本边际效率”问题。

衡量“网上经济实体”同一系列“被冲击国”之间的“制度差”的

一个依据是“市场出清速度”；另一个依据是“政治(裙带)勾结程度”。^①

“市场出清速度”取决于市场机制和政治机制的透明度或曰可观测度。鉴于“出清”必须落实到结算，因此，金融机制的效率便成了关键。除了一般新闻之外，金融信息的通约性显然最强，最容易利用全球网络。世界经济现实中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程度是最高的。十多年前，路透社等就已经开始努力。如今 GLOBEX(全球交易执行系统)已经全天候地在配置全球经济资源。芝加哥的证券双塔，已经确保无虞地运行多年，号称“除非受到核攻击，才可能发生差错”。

在全球网络经济中，倚重银行贷款的“间接融资”同倚重证券市场的“直接融资”的出清效率大相径庭。间接融资中介环节较多，主要中介容易成为“瓶颈”，信息传递速度较慢。直接融资中介环节较少，“第四市场”更属无中介的电子证券融资，双方补抛可以直接在网上进行。过去这些自动执行系统主要是增值网，且多限于(美国)国内，如今它们都已经跨上了 INTERNET!

供、需、中介三方当事人的质量也不可忽视。纵向合作、裙带勾结多的国度，政、企、银更容易不分，“包装”、“幕后”和“腐败”现象容易偏多。这势必直接影响信息显示的客观、全面和及时程度，并最终影响市场出清速度。

“裙带”或任人唯亲(Crony)还容易导致政府干预的系统性失误。而在外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中，政权的作用又举足轻重。在东亚社会中，政府的中介功能和“瓶颈效应”等问题比较突出。这虽然有利于引导外资盲入，但其风险则是有朝一日势必“盲”出。因为外资能否被“效率地使用”这一点终究最为重要。

^① 可参阅有关 Crony capitalism 的论述。该术语译法较多：亲情资本主义，裙带资本主义，任人唯亲的资本主义等。

三

就整个区域而言,基于产业次第转移的“雁行模式”的“产业联动机制”也导致了债市、汇市、股市、期市(含商品期货和金融期货期权等)的“金融联动机制”。加上网络加速效应,对危机的蔓延作用很大。新条件下,东亚的金融联动机制的滞后性表现在:第一,由于盯住美元和仰仗日元而缺少灵活性;第二,区域国际分工和产业联动机制处于转型时期,影响该区域央行合作的效率和实力。

过去十几年中,日本对外投资大幅转向东亚,投资中日元贷款比重很大。在日元长期升值的背景下这会加重偿债负担。为此,东亚各国开始将外汇储备中的美元多调换成日元。日元升值还会引起这些国家进口物价上升,宏观经济容易过热。为维持本币与美元的比价,东亚国家必须不断在汇市上收购美元,被动地扩大储备,并以外汇占款形式增发本币,从而引发国际收支型通货膨胀。为此,东亚有关国家不得不借助提高本币的美元汇价来缓释这种压力。

国际市场美元下沉、日元坚挺现象已持续十多年。但近年却风水倒转、天上地下,美元大升值、日元大贬值。这难免会給在机制上、信息上输人一筹的东亚国家带来新困难,使得“尾雁”们容易受到夹击。美元升值,一方面会导致盯住美元的已经高估了的本币更趋上扬,增加本币迫切要求转换成美元资产的压力;另一方面也会导致出口产品价格上升,降低出口竞争力和恶化经常账户。而日元大幅度贬值的不利结果是:外汇储备兑换美元的能力灾难性地降低。

东亚模式的另一个问题是:在日本经济不景气,而东亚各国经济紧追日本的新形势下,日本对外战略已经改变,过去明显地推行“日本中心主义”,即只是将简单技术和生产零部件的企业转移到

东亚其他国家,以维系“中心与边缘”的合作框架;而近年却提出了“全亚分工新战略”。导致东亚产业合作格局调整的另一个新因素是中国市场的崛起,而这一点非常重要。

东亚模式中纵向化分工减少、横向化分工增加的趋势无疑值得欢迎。但在它青黄不接之际,这种高速运行了数十年的区域合作模式的抗金融风险能力难免会受到影响。

四

除了区域联动因素,这次危机同上次墨西哥金融危机可谓无独有偶。此外,1994年英镑、里拉危机,甚至1987年的“股灾”等,也有类似因素。尽管样本特别是典型的样本还很少,新型危机的一般展开机制还是可以划分成爆发、传递、扩散、平息四大阶段。就这次情况看:

第一阶段是爆发。“套利基金”等无国界实体选中泰国进行攻击。1996年年底,泰国金融当局已陷入两难:降低出口产品成本要求稳定泰铢,但提高利率会加重企业内债和银行呆账;听任泰铢贬值,又会加剧外债偿还困难。1997年初,索罗斯通过远期合同做空数月后的泰铢,初步买下了胜局。泰国银行并未警觉,继续大开绿灯出售这类合同。到5月泰国当局发现这一毁灭性失误后,抛售泰铢已经成风。但泰国当局还心存侥幸,并徒劳地消耗了几乎全部的外汇储备来平抑市场,损失惨重。结果不得不宣布撒手让泰铢自由浮动。

第二阶段是传递。泰铢浮动并大幅度贬值后,由于区域联动和全球网络的共同作用,东南亚各国央行都纷纷入场干预,结果是一场多米诺骨牌效应。菲律宾紧步泰国后尘成为第二个宣布货币浮动的东南亚国家;缅元和马币也对美元大幅度贬值;印尼于7月14日不得不放弃固定汇率。7月18日风暴再起,泰铢、菲律宾比

索、新元、马币、印尼卢比等，均成为国际投机的全方位突击的对象。8月中旬，套利基金等又瞄准香港，造成港元下跌和股市地震。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及时地见风使舵、主动贬值，才幸免劫难。当然，前一年台海危机也给了台湾一次提前应付资本外逃的实习机会。

第三阶段是扩散。首先，由于产业联动，危机向东北亚蔓延。韩国政府大力扶植大企业集团，导致一系列的非效率。韩国和日本“主办银行”制度，也导致大企业和银行的预算约束软和不良债券多。加上短期外债太多，国际游资一哄而上、趁火打劫，韩国经济雪上加霜势所不免。日本受波及带有反馈性，日本经济和日元问题是这场危机的一个关键。其次，危机还殃及区域以外的拉美、北美，乃至整个世界经济。拉美股市出现了墨西哥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大动荡，美国股市在香港遭全方位突击时期也曾一度狂泻。

第四阶段是平息。主要力量应该说还是市场。货币贬值、股市暴跌、投资转向、破产倒闭等带来一系列利益调整，从而迫使和加速市场出清。值得关注的新问题是国际多边机构的救援，不仅力度空前，动辄数百亿美元，而且还附加了一系列直接插手一国结构改革的苛刻条件。此外，救援方针和时点的选择也耐人寻味。最后也是最近的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在汇市、股市逐渐恢复之时，印尼的政局已发生了巨大变动。最近日元对美元曾跌到近150的水平，会否继续酿成第二场风暴？这显然需要解决“网络金融危机”的预测问题。

五

上述分析表明，对于新的因素和新的危机，传统的三部门宏观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似乎都有点鞭长莫及，尽管仍很重要。因为，危机恰恰是在无国界经济实体与一系列不同的制度、不同的成长

阶段的国民经济之间发生的,而网络投资或曰投机也已经导致国际贸易和金融的国别界限变得模糊。如今世界贸易的五分之三以上是跨国公司的内部活动。

上述分析还表明,传统经济周期模型中,不仅应当增加“信息”和“预期”(这一点已实现),而且应当增加“制度”这个变量。制度的效率不同,信息利用的效率就不同,市场出清的速度也就不同。正是这种差距,导致各国或各区域对网络经济的适应能力不同,而网上投机者正是利用了自己的优势把握了这类差距的“临界点”。近几年的英镑危机、比索危机,和这次的泰铢危机等,根源都大同小异。

上文提及,新型危机还要求经济学能回答这类危机的预测问题。当 IMF 的经济学家们还在摸索的时候,少数杰出的学者专家已经先行一步。索罗斯的决策是否出于“天才的直觉”也许我们不得而知。

1995 年 9 月 26 日上午 11 时,在南非共和国首都比勒陀利亚大学召开了联合国世界经济预测项目秋季会议。斯坦福大学的美籍华人刘遵义教授在会上作了题为“下一个墨西哥在东亚吗?”的报告。他明确地得出结论:菲律宾、泰国、韩国、印尼和马来西亚是东亚地区要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

刘先生的预测方法有突破。他采行历史的实证的比较的数量分析,并使用“综合模糊评价法”,判断制度“缺口”(差)和把握临界点。以墨西哥为参照,他分析了东亚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所比较的 10 个国家和地区是:墨西哥、中国、香港、印尼、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台湾省和泰国;所选用的 10 项经济和金融指标是:实际汇率、实际 GDP 增长率、相对通货膨胀率、国际国内利率差、国际国内利率差变化、实际利率、国内储蓄率、国际贸易平衡、国际经常项目平衡,以及外国组合投资与外商直接投资比重。

根据 10 国在 10 年中的经济发展和金融情况,将上述指标中

表现较好的视为“优”，较差的视为“缺”。则经过分析和判断，刘先生得到如下结果：1. 墨西哥：十缺零优；2. 中国：一缺九优；3. 香港：十优；4. 印尼：四缺五优（一待判断）；5. 韩国：五缺五优；6. 马来西亚：四缺六优；7. 菲律宾：八缺二优；8. 新加坡：二缺八优；9. 台湾：十优；10. 泰国：六缺四优。由此他最后断言泰国等将爆发危机。

可见，虚拟经济的风暴并非不可能从外部压迫一国实际经济陷入危机。以上统计也可表明，实际上出现了危机的国家和地区中，至少一部分并不是由于自身经济“缺口多”。台湾和香港都是“十优”。这也是本文开始就提过的传统思路的一个死结。当然新型分析也需要深入。

六

新型危机是“信息本位制”和“超国界权威”对区域金融机制的猛烈矫正。其冲击直接发生在虚拟经济层面，对不同种的经济产生的不同种的震荡效应，有的主要限于虚拟经济层面，或汇市、或股市、或债市；有的则侵入到实际经济层面，失业、倒闭、衰退、滞销等。

这些，既不同于传统的“经济危机”和中长期“结构危机”，也不同于一般的“货币危机”、“股市危机”和“债务危机”，虽然它们委实同时存在。东亚许多经济患了不同的病，有的还一身多病，但新危机毕竟只是席卷它们的又一场寒气凌厉的重流感，如果我们不否认新危机应该有个较为纯粹的统一的理论形态的话。否则，我们见到的必将是一例例的永远谈不清楚的综合症和并发症。理论界对于东亚金融危机至今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根源也许正在没有将理论上的新命题（网络金融危机）从复杂纷繁的多种成分混合着的现实形态的危机中提炼出来。

从制度接轨角度看,新危机是全球经济网络化进程中有关“差距”的缩减;从当事人角度看,新危机似可表述为一场“国际金融财富的再分配”;从被冲击方看,新危机则是增长“奇迹”的突然中断、经济“泡沫”的急剧释放、东亚模式的振聋发聩的震撼。

理论形态的新危机并不说明现实形态的混合危机不再需要借助传统理论武器。日本经济进行中长期结构调整已历时多年,其产业升级换代任重道远。韩国长期以来急于赶超的“民族精神”这次也在网络经济中受到洗礼,其相当被动的结构改造显然需要时日。泰国危机的传统因素分析基本上已经成为共识。至于东亚模式的前景,也许要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景、“日元区”和国际货币制度的动向。

“日元区”在未来世界经济中将占一席之地是没有问题的。随着“欧元”的启动,美元、欧元和日元三分天下的大格局也初见端倪。一些专家甚至认为,美元区、欧元区、日元区的实力比重大约为4:4:2。尽管这些区域性货币制度终归是一种过渡状态,但会影响未来很长时间。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东亚已经告诉我们,区域汇率制度的稳定始终是个难题。

这次IMF的表现可以说是见仁见智。目前国际货币制度的改革已出现8种方案,可分成两类。一类主张加强和改善干预,另一类主张取消干预。前者较现实,包括:将IMF由消防队变成防火队,将网络投机行为变成货币供应的稳定器,重新让美国领导新的布雷顿,发行统一的世界货币,形成若干货币区等。后者较极端,要撤消IMF,实行完全的私有化和自由化。

七

东亚金融危机首先给了欧洲一个极好的教训:有管理的区域货币联动很容易不稳定和遭受攻击,很难找到能够持续地协调各

国实力消长的办法。这场危机也给了美国一个教训：亚洲的日本不再可靠，而中国则成了该地区最重要的稳定因素。危机还给了日本一个教训：“脱亚入欧”并不容易，以政府、企业、银行之间任人唯亲关系为基础的日本式间接融资模式的奇迹在网络经济中已经宣告终结。

东亚危机也告诉新兴经济：网络经济改造各国机制的要求是任何开放经济所无法回避的。如果说，日本、韩国面临的任務主要是网络化，泰国等面临的主要是现代化和网络化，那么我们则面临三重任务：除了现代化和网络化，还有市场化！三大任务对于计划经济传统深厚的转轨经济，蕴涵着许多现实的难题。

从全球网络看东亚金融风暴，要求我们全方位地更新观念，彻底地反思我国改革开放的战略和政策。

第一，新形势下民族国家的传统干预能力正变得脆弱，更加充分的国际信息合作正变得愈来愈重要。按“信息本位制”行事的超国界权威们煽风点火之后，一国有限的外汇储备和局部联动机制的作用很容易变成杯水车薪。而在约束、规范和预测网上“超国界经济实体”的经济行为等方面，单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还几乎无能为力。

第二，市场制度必须彻底才能从容地走向网络世界和知识经济新时代。制度不到位时，开放切忌过速。追求经济增长时，制度发展必须放在首位。东亚传统文化中，纵向合作意识一直比较强，“裙带”或任人唯亲成分一直比较多，这对于支持高度透明的市场决不是一个长处。而只要市场不透明和不彻底，其出清速度从而稳定金融的能力就很难不发生问题。责怪对手“缺德”不如退而结网。

第三，“落后就要挨打”在冷战结束后并没有过时，国际利益集团的再分配努力并没有丝毫的放松。西方有学者认为东亚危机是西方价值运用不当的产物，然而又是谁起劲地急于打开新兴市场

的大门呢？股市、汇市猛亏之日，正是套利基金等“超国界权威”巨赢之时，而这些基金的头目正是当今西方社会的大慈善家！纵观世界经济史，“廉价石油”、“美元体系”、“高利率政策”、“美元日元大错位”、“毁灭性地创造”，乃至“网络金融”，哪一项不是落后者遭殃？正视差距实在重要！

第四，改革开放中许多重大举措值得重新彻底反思。东亚危机这免费的一课坦诚地告诉我们：“学韩国组建大企业集团”、“酝酿在近期打开资本账户这最后一道防线”、“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原则”、“加速放开国内金融服务市场”，等等，都值得重新权衡。“人民币汇率”在中长期内也将是一个难题。仰仗外汇储备是不够的，关注制度差和信息差的“警戒线”应当常备不懈，“千万不要忘记”。美国的外汇储备并不多，香港、台湾、日本的外汇储备却不少。由此，“科教兴国”和“大力改革政府机构”，还有探索新时期中国的“新政”等，都是现阶段最明智的选择。

萧 琛

1998年7月5日于中关国

目 录

代序:从全球网络经济看东亚金融风暴	(1)
第一章 国际自由电信与网络革命	(1)
第一节 信息技术突飞猛进与全球网络	(2)
一、信息处理技术加速发展	(2)
二、信息传输技术跃上新台阶	(5)
三、信息高速公路正覆盖全球	(9)
第二节 国际电信自由化风潮与全球网络协议	(15)
一、“及时联系”正让世界天翻地覆	(15)
二、国际电信产业自由化成就斐然	(19)
三、WTO 三大突破性协议继往开来	(24)
第三节 信息网络革命彻底改造世界社会经济	(30)
一、全球网络与第三次通信革命	(31)
二、消费者、劳动者和投资者的福音	(35)
三、全球网络缔造新的主导产业部门	(43)
第二章 全球网络与新型作业管理	(50)
第一节 信息反馈加速与用“脑”制造时代	(51)
一、“智力”日益取代“体力”在制造与服务中的地位	(51)
二、“有求立供、供随求止”和 JIT 管理蔚然成风	(54)
三、及时的联系与反馈开启作业新纪元	(59)
第二节 “福特流水线作业制”发生方向性变革	(68)
一、“批量生产”和“工序分解”正在被否定	(68)

二、个量化经营和一体化管理困困“福特制”	(70)
三、“广度经济”与“规模经济”相辅相成	(73)
第三节 微观作业机制信息化与“特别作业班组”	(77)
一、日探索“信息型作业”人力资本组织技术	(77)
二、美“特别作业班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81)
三、发达国家新型作业组织技术的成就和问题	(85)
第三章 全球网络与新型企业组织	(92)
第一节 市场信息化与公司内部组织结构变迁	(93)
一、市场信息化呼唤企业制度“第三次变革”	(93)
二、企业内部结构正由“金字塔”转向“网络型”	(96)
三、全球网络经济中企业组织结构新原则	(100)
第二节 全球市场信息化与企业外部合作结构变迁	(104)
一、注重合作的新型“战略联盟”全球风行	(104)
二、“系列”是日本企业“战略联盟”的灵魂	(109)
三、美借鉴日“系列”方兴未艾后来居上	(114)
第三节 市场信息化透视未来企业“新边疆”	(120)
一、“智能资本管理”日益决定企业的命运	(120)
二、企业总部正回归大自然和迁往“准都市”	(124)
三、全球网络经济更注重“公平”和“纯洁利润”	(127)
第四章 全球网络与新型政企合作	(131)
第一节 利益格局变动导致政企合作模式转型	(132)
一、公司本身沦为炒作对象使政企利益分流	(132)
二、“外资收购”加剧美国的公司与国家利益的冲突	(135)
三、全球网络经济中政府和企业的新纽带	(137)
第二节 强调“人力资本”与淡化“所有权”和“控制权”	(142)